

IMPOSSIBLE GILLETTE.



FERDINANDO FREGA

— NANDO THE SCRIBE — フレガ・サン — Ferdinando —



不可能的 GILLETTE

THE SYSTEM · 09

一部第一人称的故事集——父亲借着摩泰台拉香肠教的心算课、一次俄罗斯式的出逃、水果小贩凌晨三点的道歉、一次扮成酒店门童的乔装、一张过时了二十公斤的护照照片，以及一部关于种种不可能的幸存的编年史——在这些故事里，Gillette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作者皮肤之下的操作系统。

版权页

Ferdinando Frega——Nando the Scribe——第五片刀片

行为准则的叙事先驱。他围绕一个想法，建起了一个一美元的出版生态系统：金融的问题不在钱，而在行为。

在**ONEDOLLAR-STORIES**生态系统内编辑与策划。数字架构：**NAPLES-POST · NOASPECTTIME · ONEDOLLAR-STORIES**。2026年首次出版。采用简洁、现代、为数字阅读优化的版式。在美国出版。

版权声明

© 2026 Ferdinando Frega。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作者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复制、分发或传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包括影印、录音或其他电子或机械方法；但评论文章中的简短引用以及版权法允许的某些其他非商业用途除外。禁止未经授权使用、复制或分发本作品。

前言

在这本书开始之前，先说清楚一件事：我不卖书，不靠书赚钱，不转化读者，也不索取任何东西。我在市场之外写作，不是为了讨好它，而是为了揭示它无法控制的东西。是网络本身把我的名字推进了Gillette的搜索里，这就是这部三部曲存在的原因：记录Gillette人——不是作为产品，不是作为广告活动，而是作为一股力量、一个人物、一种架构。他什么也不要。他什么也不期待。然而，他已经得到了要紧的东西：认可。在一个由数十亿美元的体系统治的世界里，这本书是一个证据：一个声音可以不经许可、不作妥协、不标价格地升起。

“不可能的GILLETTE” 真正的含义

不可能的GILLETTE，是一个男人不再是体系的一部分、而成为体系标杆的那一刻。

在这里，**Frega**——一个由纪律、精确和内在几何打造出来的人——与**Gillette**相撞，而这个品牌刮掉的不是脸上的胡子，是借口。

大多数人加入一家公司。而公司会改写其中少数几个人。我属于第二种。

“不可能”与困难无关。它关乎必然——那个点上，一个男人的架构和一个品牌的DNA锁定在同一个频率上，拒绝分开。

不可能的Gillette = 一个由标准锻造的男人，一个融入身份的品牌，一种拒绝脱离自身纪律的人生。

声明

“不是我选择了Gillette。是我的架构认出了它自己的倒影。”

或者那个像一扇铁门猛然关上的版本：

“我不是为Gillette工作。我把它的标准带在血液里。”

这不是品牌包装。这是用刀片刻下的传记。

开篇

“有些人上班打卡。有些人被塑造。我是被塑造的。Gillette不是一份工作——它是我皮肤之下的操作系统。它教会我时机、精确，以及让我一直站着的纪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它不可能：你没法把它从我身上拿走，除非把撑着我站立的结构一起扯掉。”

第一刀之前

大多数人一生都在努力被那些不是他们建立的体系接纳。企业体系。出版体系。社会体系。家庭体系。

他们适应。他们谈判。他们等待认可。

我从来没有那份耐心。

我的人生由三片刀片塑造。

第一片属于一个人，他把一个被丢弃的想法变成了现代史上最知名的名字之一：**King Camp Gillette**。

第二片属于我的父亲——在The Gillette Company里待了四十年——他教会我，纪律不喊叫；它校准。

第三片是看不见的。它属于我。它切过行业、身份、国家、失败、成功、写作、沉默——以及那些至今仍不知道该把我放在哪里的体系。

这本书不是对成功的庆祝。它不是回忆录。它不是商业手册。它不是寻求认可的文学。

它记录的是：当一个人不再问自己属于哪里，而开始建造迫使现实承认他的结构时，会发生什么。

有些名字卖产品。有些名字消失。有些名字在那只手离开很久之后，仍留下印记。

这是三片刀片的故事。也是为什么一个名字从来都不够。

摩泰台拉香肠

我五岁，但不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孩子。有一个像我这样的父亲，你会明白为什么。

他每个星期一天一亮就出门，整整一个星期不见人影。Gillette把他寄养走了。她只在星期五晚上把他还给我，他按门铃，我跑向他——先是抱他，然后把他的Fiat 127“开”进车库。公司的车。

车里，他坐在副驾驶座。我留在方向盘前。我们的谈话活在另一个维度里。

他告诉我，我得学会心算。因为总有一天，要是找不到计算器，我会迷失。于是，练习开始了。

“Nando.....如果100克摩泰台拉香肠卖800里拉，我买120克，要付多少钱？”我立刻回答。他是我的父亲——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在我心里建造的是什麼。但他的爱那么大，只要是从他那里来的，什么都不觉得沉重。

然后他接着问：“那我买90克呢？八十二克呢？”每一次都是准确的答案。我不想让他失望。那种本能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多年以后，我在学会计的时候，他问出了世纪之问：“如果我100买进，120卖出，我的加价率是多少？”“百分之二十，”我说。

“好。”

“可如果我100买进，120卖出，我要算毛利率，是多少？”他看着我。我没让他开口。“百分之十六。”

他一句话也没说。他笑了。然后走开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Gillette的儿子之一。

Nando。

小偷

大多数读者——诚实的那些——会被这样一种尝试吸引：去理解一个小偷究竟是什么，他如何演变，他在一个根本算不上角色的角色里代表着什么。

但要小心：我呈上的不是意大利议员名单，这无关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我只是凭着眼光和经验，描述那些越过了那条线、又设法回来而没有引爆、仍对着司法微笑的人。

他不属于任何行当，也不属于任何职业。法律把他简化为“罪犯”，但**小偷**这个词，直白地说出来，在世界上任何法律体系的刑法典里都不存在。

小偷的话。

剩下的是一门艺术：机巧、需要、机会、一种生活方式（modus vivendi）。

最出名的是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小偷。不那么出名的——也危险得多的——是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小偷。

两者都要付出代价，但秘密在于一条古老的犯罪原则：动手之前，你必须先找好罪人，并造好证据。只有这两样东西，能给你一条可能的——永远不是绝对的——退路。在那之后，你才能策划。

一个体面的小偷保持匿名。他从不坐牢。他不悔过。他不认罪。他不分享。他生来如此：守口如瓶。

人们被他吸引。不可预测的东西，总比显而易见的东西更能抓住人，哪怕它带着一种没算计过的风险。

司法机关遇到这样一个人时，会称赞他。而他们首先寻找的不是手法——那是留给好奇者的——而是赃物。

就连在这里，人物的身份也显露出来：永远不要把所得留在自己的边界之内。而今天，边界已不再是国家——而是大陆。

2026年4月的一项欧洲指令规定，所有银行都必须联网，并由共同体内每个国家的税务机关自动监控。第一批小偷早在那之前就做好了准备。

剩下的选择是其他大陆——那是小偷唯一还有存在理由的地方。

至于天主教会：几个世纪以来，它修改过第七诫，但没有人谈论这件事。在《旧约》中，这条禁令指的是绑架一个自由的以色列人，把他卖为奴隶。后来它才演变为对偷盗的一般禁令。

而当犯罪转向认知领域时，医学文献不得不发明一个词：**操纵**。

我们走着瞧，文学接下来会发明什么。至于我，我希望有一天能因为第一宗**文学认知盗窃**的指控而出名。

Nando

健身房

有一根细线把一对伴侣系在一起。“聪明人”说：**钱和利益**。病态的人说：**性**。真正懂的人说：**健身房**。

为什么？因为这个答案解决了95%的感情问题。

钱和利益

只有在没有别的可给的时候，它们才能撑下去。不是福分——是局限。你只活出了50%的人生。更好的那一半永远锁着。

性

男人是机械的：他需要释放、需要失去、需要清空。女人是认知的：她像读一套密码一样读自己的身体。她不放弃，不屈从，不崩溃。她选择。

有趣的部分

一对伴侣是这样诞生的：

他想：“我是她的第一个、最好的、唯一的。是我让她爱上了我。我会跟得上。我母亲没把女人的事全告诉我，但我能应付。”

她想：“好。但愿他是最后一个。我会把他调教好。他不算太聪明——这是优势。他是个男人：早晚会趴在我肩上哭。”

清晨的真相

她赤身站在镜子前。她熟悉自己身体的每一寸，就像熟悉一个私人王国。她看见多出来的一厘米，一道正在移位的曲线，一只乳房把目光垂向膝盖。于是她明白了：**她的身体是她的附加值，她的武器，她的外交。**

于是，她去健身房。

但因为她是认知型的，她先从他身上开刀：

“你知道吗，昨晚你不是我嫁的那个男人。三分钟你就睡着了。你打呼噜。你有肚子了。你已经两年没见过你那位老朋友了。”

十二秒后，他慌了。“我该怎么办？”

她回答：“你去健身房。我也去。这样你就不会无聊了。”

问题来了

健身房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会吸引**不该结交的人**。那种会把一个男人变成小偷的人。而在小偷中间，老实

人活不下去。

接着是背叛。而代价比月费高得多。

剩下的，大家都知道。说出来只会揭开伤口。而本作者不揭伤口：他给的是微笑、思考，还有那一滴你永远忘不了的苦涩。

Nando

2025年

火车与意外的帮助

在**佛罗伦萨**，我下了火车，坐在一长椅上。我需要时间想一想。

跳到铁轨下面，技术上是可能的。可是，那会在铁轨上留下血。得有人去清理。

在意大利，他们说不定还会向你收清理费。

再说，我并没有迷失自己。自杀属于那些失去了认知坐标的人。我的坐标还完好无损。

这时，看着一个美丽的女人穿过车站，我想起了生活。也想起了我已经有过的许多经历。

不久，我走进车站的咖啡吧，请求打一个电话。我打给妻子，向她解释我的决定。

我告诉她，我要去**威尼斯**看我们的儿子们。我还说了确切的到达时间。

这个决定显得合乎逻辑，也合乎理性。

我的孩子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所创建的家庭的自然延伸。

我回到火车上时，查票员朝我走来。不巧的是，我没有票。

他告诉我，我得在下一站下车。否则，他就叫铁路警察。

那一刻，我用上了三样工具：**能力、创造力和解决办法。**

我平静地解释说，强迫我下车可能会制造一个更大的问题。我告诉他，我可以跳到铁轨上，让火车停上好几个小时。

他突然不说话了。

接着我问他，到下一站要多久。

“至少一个小时，”他回答。

在那一个小时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两位托斯卡纳的女士坐在我对面。我立刻明白，她们是去开会的大学教授。

起初，我们只是简单地交谈几句。然而，好奇很快取代了距离。

大约三十分钟后，其中一位回来了。

她手里拿着一张火车票。

我的票。

又一次，女人成了我意外的幸运。我从未否认过这个事实。

被称为女人的这种人，承载着一种极少有人真正懂得的深度。

下车之前，她给了我她的电子邮箱。我想以后把钱还给她。

然而，生活继续向前，这件事始终没有发生。

威尼斯与第二次出发

火车终于到了**威尼斯**。

远远地，我看见了我的儿子们。

Vincenzo, 193厘米。 Francesco, 188厘米。

他们在通道里高出人群一截。

他们来接我回家，把我重新安顿好。

很快，他们帮我重建了基本的稳定。我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吃了饭，休息了。

那之后，问题开始了。很多问题。

他们真是他们母亲的儿子。

四个月後，**6月27日**，又一个决定出现了。那种老派的家庭本能试图把我拉回去。

他们想让我回到以前的职业。

经理。

Nando

续篇

然而，我不往回走。

从来没有。

相反，我以向前走来面对失败。

用所剩无几的一点钱，我买了一张机票。

目的地：**葡萄牙**。

我没有确切的计划。

不过，我知道该怎么行动。

里斯本，一切的开始

我先到了**波尔图**。青年旅舍里，二十四个人睡在同一个空间。

我的资源几乎耗尽了。

于是，我往南走，去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我到了**贝雅**，大约五百公里外。

然而，只过了一夜，我又回到了**里斯本**。

7月3日，我终于找到了一张床。

合住的房间。合租的公寓。

九个人住在三十五平方米里。

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填满了那个空间。

那里的条件更接近一间非洲茅屋，而不是一个现代的家。

费用是**每月230欧元，外加100欧元押金**。我全付了。

付完之后，我一分钱都不剩了。

没有食物。

只有一个睡觉的地方。

尽管如此，那段时间变得至关重要。它可以概括为三点：

a) 减掉**二十公斤**，彻底改变我的饮食；b) 只靠**每月七十欧元**活下来；c) 把出版计划成形，至少是草稿。

我在那里一直待到**2025年11月22日**。

最终，我决定回意大利。一些保证让人觉得，可持续的条件也许终于有了。

我希望这能行得通。

不过，必要时，我随时准备再次离开。

接着，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发生了。

从**12月9日到12月26日**，短短**17天**，一切都变了。

之前的三年突然变成了准备。

现在，世界看得见我了。

而我也终于看得见他们了。

没有中间人。

没有控制整个过程的平台。

在我的行动中，我依然自由。

我依然是我自己。

圣诞快乐。爸爸。

作者的反思

回望2025年，我看到的不再是断裂的一年。相反，我看到的是澄清的一年。

一无所有地离开，迫使我丈量拥有与身份之间的距离。金钱、舒适和确定性很快就消失了。然而，某种更强大的东西留了下来。

当其他一切都崩塌时，身份活了下来。

那几个月的动荡像一道滤网。幻想消失了。期待消融了。借来的角色终于脱落了。

剩下的，是本质。

自由。

随后的那些计划并非出自策略。相反，它们是从需要中长出来的。

到头来，那一年没有摧毁任何东西。

它揭示了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

教古巴人

我降落在迈阿密时，已经知道那座城市里没剩下多少“美国”了。那地方就是空调更好的古巴。来接我的出租车司机当然是古巴人。他问的第一件事：我是不是一个人，要不要人作伴。没有超市，没有购物中心，没有明信片上的美国。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第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住处时，有人敲门。是警察。他们让我吃了一惊，但他们不是来找麻烦的。他们是来通知我，第二天上午我在美国领事馆有个约。十点半整。

第二天，我准时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开了门，告诉我很快就会见到顾问。接着她出现了：高挑、纤瘦、金发、优雅，打扮得无可挑剔。她和我握手，提醒我，我们多年前在罗马见过，那时她在教育部担任第一执行主任。

“我当然记得您。您好吗？”我说，真心高兴再见到她。

从那一刻起，罗马没有一个人明白，为什么我连薪水都没问，就拒绝了她的邀约。那是一份大邀约，一份认真的邀约——对我这样一个简单的人来说太认真了，超出了钱，超出了野心。

“我希望您至少用30天，为年轻的古巴经理们做一个培训和沟通项目。您想要的一切都会有，而且更多。请别说不。”

课程从10点到12点，然后从2点到5点。

我记得第一堂课：大约五十个人，一半男人，一半女人，全是专业人士。照例自我介绍——大声说出名字、姓氏、年龄——之后，我开始讲古巴笑话来热身我的西班牙语。他们都想知道我来自古巴的哪个地方。

第一个真正的思考时刻，是我强调教与沟通之间的区别——这是许多意大利人甚至都不明白的事。

日子飞快地过去，最后，一切以学员们为我做的一个蛋糕收尾。他们为我们一起度过的30天感到高兴。每个人都想要我的电话号码。

他们震惊于我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

我年轻时是个橄榄球运动员——一种运动员的心态。与此同时，那位意大利顾问邀请我共进晚餐，以示庆祝，也终于弄明白她错过了什么。人们对我是如此依恋，简直忘不了我。

我是个幸运的人，面前总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一个美好的女人在30天的沉默后邀请我共进晚餐；第二种，我命运的声音告诉我，该走了。

一个礼节性的吻，一声再见，她问我：“你要去哪儿？你要把我一个人丢下？”

吻别了她。走了。再也没有回头。自由让我付出的，向来比舒适更多。

Nando

香蕉

得到的教训

在我人生的第三阶段，我新的饮食习惯包括早上吃香蕉。头一天晚上吃完了，第二天就从一片空白开始。

2025年12月的一个早上，我去了楼下的水果小贩那里。我认识他已经四十五年多了。他跟我打招呼，说了声“欢迎回来”，问我要什么。

——香蕉。要是熟透的，哪怕是便宜的，我更想要那些。——不，我只能给你这些，——他回答。

价格：每公斤1.45欧元。青的还是黄的，随我挑。

我要了一袋5欧元的。我带着狗，而在这一带，牵着狗走进店里仍是一种禁忌。

回到家，好奇心——一个贫穷童年的女儿——驱使我称了称那袋香蕉。2.752公斤。我本该付3.99欧元。剩下的那一欧元，谁也没提。

我是个好人。宽容。我以为是个差错。但怀疑一旦产生，就必须去核实。

三天后，我又去了。同样的程序。狗也带着。

——1欧元的香蕉。他给了我四根小的。

我在冰淇淋店的朋友拿着他的秤等着。0.456公斤。实际价格：0.66欧元。少找的零钱：0.34欧元。

第一次是怀疑。第二次是核实。我需要第三次才能确定。

当天下午，我又回去了。同样的场景。又付了5欧元。

这一次，我那位做货运代理的朋友在等着。专业的秤。2.90公斤。实际价格：4.20欧元。他收了5欧元。还是没找零。

几天过去了。我得考虑这个人、这个处境、这个环境。正面对质可能会给我的家人惹麻烦。有些人对言语没反应。

但我的名字是Frega。而被人抢，不是我的性情之一。

我的报复换了一种形式。

五天后，我没带狗又去了。我要找老板——那位父亲，比我大几岁。

——听着，我朋友说上次的香蕉好像太多了。我在家称了：3.90公斤。按标价我该付5.65欧元。你只收了5欧元。我是来把差价补给你的。

我递出0.65欧元，清清楚楚，让人看得见。

——除非那是折扣，因为我们认识四十年了。

他瞪大了眼睛。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僵住了。是经验救了他。

——那是折扣，——他说，——给特别顾客的。

我把硬币放回了口袋。

——谢谢，——我回答。——但我以后不在这里买东西了。这些“特别顾客”的关照让我很为难。我没有理由接受它们。没有正当的理由。还是谢谢你。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全都明白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从店门口走过。没有评论。只有低垂的眼睛。它们说出了他们从来没有勇气说出口的话：对不起。

道理很简单：从一件坏事里，你总能提取出一件好事。我的成功就是这样运作的。

这就是我。而我仍然吃香蕉。

Nando

续篇

凌晨3:23。寒冷的夜。寂静。对讲门铃响了。所有人都醒了。

我女儿低声说：“他们来抓你了。你的拉杆箱总是准备好放在卧室门后面。”

她不相信我的故事。她没有读到真相。她不信任我。我甚至算不上可信。她只是解读了一些字句。而那才是真正的痛。

我接起对讲机。一个声音说：“抱歉这个时候打扰，但我得和您谈谈。我是您家附近的水果小贩。”

我让他进来。他快八十岁了。等我披上睡袍，他已经坐在家里最大的房间里了。客厅。

他情绪崩溃。满脸泪水。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他只求一件事：“我开始说的时候，请别打断我。”

我没有打断。

“那天晚上我们有过那么一刻。您记得。您想为香蕉付我六十五分，而我给了您折扣。”

“我记得，”我说。

“您走了之后，我和家人坐在桌边。您给我的那一课很重。对我来说。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

“我只想知道您是否原谅我。也想请求您的原谅。”

他拿着一块布手帕，擦着一滴不断回来的眼泪。

“原谅我这个时候来。不先见到您，我睡不着。而找到您并不容易。我们在网上搜了您的名字。出来三个网站。全是英文的。我们看不懂上面说什么。它们什么也不卖。它们什么也不要。我们不明白那些网站是什么。”

他笑了。

我站起来。请他也站起来。我紧紧地拥抱了他。

我告诉他，我不是教授。不是老师。我没法给任何人上课。我只是用了一个父亲的常识，在那里，规矩和原则先于任何经济逻辑。

他离开时，问我还会不会再去他的店。我回答：

“过去教人。现在从不被遗忘。未来活在我们的梦里，在那里我们看见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已经在未来之外了。因为我在建造代代相传的财富，而不是留给后人的那些大概的东西。”

他并没有真正明白我的意思。那是我认知的一面——在寥寥几个字里，什么也没有，可如果你仔细听，一切都在。

Nando

在死亡门前

一个人明白生命已经替他做了选择的时刻。

诊断

每当我讲述一段亲历的故事，我总是先笑，然后纳闷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那种处境不合常理，近乎超现实。然而，它塑造了我的人生，所以我觉得非讲不可。

2007年1月。我在一家临床化验室外，等着手术的结果。在相隔仅三十天的两次手术之后，我的小肠里被切除了七个类癌。

一个我面熟的清洁女工悄悄走近我。

“我很难过，”她说。“我听说了……恶性肿瘤。您该去看肿瘤科医生。”

那一刻，死亡成了最近在眼前的可能。然而，理智很快介入了。

我想到了我残疾的女儿。逃避已不再是一个选项。因此，我必须活下去，建设她的现在，保护她的未来。

不久，肿瘤科医生证实了一切：神经内分泌肿瘤，预期寿命大约三十天。

带着那些话，我沿着一片空无一人的海滩走着。风打在我的脸上，海浪低声说着某种我当时还听不懂的东西。

决定

1月28日。

我开车去那不勒斯，寻找老朋友和以前的客户。我需要钱，需要一个新的开始。然而，没有人投一欧元。

他们只是请我去餐馆吃晚饭。

几天后，2月6日，我人在那不勒斯，身上只有275欧元，没有信用卡。按照诊断，还剩十五到二十天。

在高速公路出口，我得选择往南还是往北。

这时我妻子打来电话。

“回家吧。”

她以为自己是在和抑郁说话。然而，她看不见我身体里那场激素风暴在干什么。

于是，我选了北。

罗马尼亚

两天后，我到了罗马尼亚的布拉索夫——德古拉的地盘。

这趟旅行不是为了一个女人。相反，那纯粹是本能。

我口袋里只剩二十欧元。够去死。肯定不够重建。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重建。

在一家咖啡吧，我点了卡布奇诺和羊角面包。我立刻注意到，罗马尼亚女人有一种罕见的美。然而，当地男人往往缺少殷勤。

女服务员发现我没有零钱。她没有把我打发走，而是听我说。我们聊了三个小时。

最后她哭了，甚至要给我钱。

我拒绝了。

我只问了一个问题：

“赌场在哪儿？”

她一头雾水，指了指街那头。

我带着二十欧元进去。到凌晨五点，我带着四百五十欧元出来。

Nando

续篇

重建

不久，我以280欧元租下了一套四楼的公寓。女服务员为房租作了担保。

下午，我认识了几个在地铁站工作的姑娘。与此同时，我开始建立友谊。

接着去买了一趟菜。一百五十欧元的食物摆上了柜台。然而，我只付了十二欧元。金枪鱼半价白送，肉是屠夫送我的。

赌场成了我每晚的银行。与此同时，我的公寓渐渐变成了一个聚会的地方。

卡拉布里亚的风味在餐桌上轮番登场。故事流传。生活悄悄地重新开始了。

一次从未发生的回归

2007年12月。

死神把我忘了。

我妻子又打来电话。

“赶紧回家。”

我只剩十二欧元。然而，一张航空公司的代金券让我得以离开布加勒斯特。

飞往雷焦卡拉布里亚的航班在半空中出了问题。我们被改飞到了苏黎世。

在机场，我又一次即兴发挥。在英航的休息室，我抓起排队用的隔离柱当话筒，唱起歌来。

空姐们笑了。

不久，她们给了我一张飞伦敦的机票——外加一百英镑。

伦敦、巴黎、罗马、那不勒斯。

每一步都需要发明。每一刻都需要胆量。

最终，七天后，我到了家。

余波

我妻子气坏了。

“你去哪儿了？跟你那些姑娘在一起？”

我笑了。

“幸好有她们，”我说。“不然我现在还困在苏黎世呢。”

不久，我开始了新的工作：一家临时劳务中介、建筑，以及安保服务。六名员工启动了该项目。每个月的利润都拿去再投资。

然而，没几个人相信它。

崩塌

2008年，我回到了罗马尼亚。

中介发展到258名欧洲员工。建筑业务与一家意大利跨国公司合作。与此同时，安保业务做起了核电焊接。

我学了罗马尼亚语，能读、能写、能说。故事和笑话打开了每一扇门。

然后，在12月，我把一切都送了出去，走了。

女人们抗议。

“没有你，什么都活不下去。”

三个月后，一切都崩塌了。

为什么？

因为饥饿无法委托。经验无法转让。职业道德无法赠送。

真正的教训

一个身无分文的意大利人，靠罗马尼亚女人撑着，听起来也许像一场梦。

然而，现实教给人的东西要严酷得多。

真正的饥饿，只为那些把它装在心里的人鼓掌。

最后的话

我出生时，他们给了我一个像我这样的姓——**FREGA**——一个常常和小偷、骗子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六十一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证明相反的事。

因为名字不定义我们。

定义我们的是品牌。

而品牌只能靠行动建立。

Nando

没穿内裤

昨天是累人的一天，但也是解决问题的一天——一如既往。我从来没有毫无目的地浪费时间：我的认知时间遵循严格的规则；女性的时间则什么规则也不遵循。

然而我一个人上床睡觉，因为我妻子决定来一次“暂停”。抱歉——是停经。我笑了。她没笑。

我女儿没放过机会提醒我，61岁的我已经“老了”，在私密的领域里我不会有力气、也不会有胆量去应付一个女人——我肯定会垮掉。她是我的女儿，我的生命。一个微笑就足以说明一切。但我忍不住甩出了一句：

很多人用它只是为了上厕所。有些人拿它当英雄。有些人用它来产生想法。有些人先当了父亲，然后当情人。还有些人只是看看它。

我把它变成了一件全职的工作工具——税款在源头代扣。

她爆笑起来，停都停不住。我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确认了她一贯的判决：“你就是魔鬼。”说得也对。

我脱了衣服准备睡觉——晚上11点。换上一套舒服的运动服。像每天晚上一样，看十分钟手机，然后睡觉。

凌晨5点左右，有什么东西掉了。我觉得冷。我伸手往下摸裤子和内裤——两样都不见了。

谁干的？没有派对，没有客人，没有邀请。那么，是谁打开了保险箱？

我仔细检查了家传珠宝是否还在、是否完好无损。然后我注意到，我的“老朋友”比我先醒了，确信有活要干。

活确实来了——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是我为之而活的那种：**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让你笑一笑。**

Nando

一个俄罗斯女人

2006年6月——开始

我当时经营着自己的批发生意——家居护理、个人护理，还有伟大的幻觉。我以为自己很强。其实我只是傲慢。

7月，里米尼。一个展会，到处是前同事、客户、朋友，还有女人。太多女人了。就在那时，我明白了展会为什么存在：你说是“工作”，但那只是一个托词，好消失到别的房间里去。

我从不跟女招待们演那套伤心丈夫的戏码。不是我的风格。我总是说我爱我的妻子，她也爱我——因为我回家时带着钱、带着经验，也不带任何会传染的意外。

那天晚上，我叫了一个职业女郎。她的两个小时，干净、简单、低风险。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她来了：美得像冬天的海，身材完美，气场强大。她立刻要钱——她不是医生；她更像个急救员。

我挽住她的胳膊，叫她准备一下：我要带她去城里最好的餐馆，而且我想买下她接下来的24小时。

“你给我多少？”我把口袋里的钱全给了她。她开始数，数乱了，明白自己踏进了另一个级别。

她问我有没有什么瘾、什么癖好、什么奇怪的游戏。我告诉她，我是一个由运动养大、由一家跨国公司训练出来的人，一个没有执照的人生看客。

她放松下来。我们走路去餐馆——她不肯坐出租车。她打电话叫一个朋友过来一起。我理解：外国，要小心。说得过去。

晚餐很平静，几乎有些浪漫，但我保持着认知的清醒。在把家传珠宝托付给她之前，我得知她是谁。

回到住处，她在走廊里就向我扑来。没时间上床。我们把显而易见的一切和那之外的一切都消耗殆尽。

八个小时后，我要走了。她求我别走。于是，我许下一个承诺：“今年年底之前，我带你回俄罗斯看你的家人。” 她不相信我。我要了她的电子邮箱。她给了我。

Nando

圣彼得堡——沉沦

2006年11月。我给她发邮件：准备好飞俄罗斯了，把你的银行账户发给我。她还是不相信我。于是，我给她的家人汇了钱。

机票。签证。米兰——圣彼得堡。

在Malpensa机场，她又要更多的钱。语气变了——从友好变成了权力。我不喜欢。

航班上一片沉默。她母亲在机场接我们。她们把我带到一套公寓。不许住酒店。

我们去市场买了吃的，和她的家人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她走了。我被锁在里面。

第二天早上，我试着开门。锁着。不是绑架——只是一种受控的看管。

她11点来了，笑着。下午我们要去城外一座别墅（dacha）做客。

她的朋友和一个小伙子来接我们。到处是雪。我们到了她父亲的那位克格勃上校的家。

谈话全靠我的英语撑着。别墅富丽堂皇。连坐浴盆的把手都是金的。

每道菜都很精致，每个时刻都配一种不同的酒。然后他们带我去一百米外的男士桑拿。外面零下20度。蒸完桑拿，我们赤身站在雪

里。俄罗斯的传统。我没问接下来是什么。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睡，在一个装满了窃听器的漂亮房间里。她睡在别处。

早上：和上校一起吃早饭。然后他给我看他的汽车、他的摩托车，腋下夹着一只巴哥犬，开车带我在别墅周围兜了一圈。

下午：回到圣彼得堡。晚上：她试图支配我，控制我。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第二天，我们沿着主干道开车——20公里的商店、品牌、财富。不是一座穷城市。仅次于莫斯科。

和上校一家吃晚饭：二十种鱼子酱，吃不完的食物，每人一百美元。然后回到我的监狱。她又把门锁上，走了。

第二天她回来了。我出去了一下，叫了一辆出租车，逃了——所有的行李都丢在了后面。

她像疯了一样打电话。我终于接了：“我在机场。”她和她母亲一起赶到。她们威胁要去警察那里告我，向我勒索钱。我付了。登上飞机。飞回米兰。

噩梦结束了。但她已经进入了我，她也知道这一点。

Nando

回到生活——出口

回到意大利。我上了车，开往都灵去工作。她打来电话。

她的声音不一样了，甜美、礼貌、温柔。女性人格的魔力。我知道她很危险。让步就意味着失去自己。

她不停地打电话。她要我星期四18:00去机场接她。17:00时，我在都灵——皮亚琴察高速公路上。改变方向开过去，本来很容易。

可我关上了门。并且明白了一件终极的事：

女人是强大的。当她们想要什么，她们就拿走——不用问。

事后的反思

我们从桑拿里出来，赤身走进雪里。零下二十度。一个前克格勃上校冲我笑着。俄罗斯男人们笑着，仿佛这算不了什么。

那趟旅行中，第一次，一个简单的念头击中了我：

要是这事搞砸了……我打给谁？

答案来得比恐惧还快：

谁也没有。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真相：我并没有身处危险。我是身处我的世界之外。

而当你踏出你的世界，你得到的不是保护。你得到的是后果。

Nando

墓地

那是1975年5月。我十岁，第一次跨过那道门槛。我以为自己走进的是一个痛苦的地方。我只是个孩子。结果，我发现那里只装着两样东西：一具身体和一段记忆。

身体被封在一个水泥盒子里——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在意大利，这很正常；在别处，仪式不同，但只是出于文化原因，仅此而已。

记忆活在照片里。路过的人认出你，或第一次看见你。你留下的一切都被困在那张图像里，而花只说一件事：*我没有忘记你*。

但既然我从来不像别人，停在这种分析上，就等于把大家都在说的话复制粘贴一遍。所以，让我们换个角度看墓地：**一个娱乐场所**。

人们反复说那句话，是有原因的：*葬礼上人们笑，婚礼上人们哭，而在那之后……嗯，没人谈起，但离婚是由纯粹的绝望和孤独做成*

的。哈哈哈哈哈。

我首先想起的，是十六岁时打橄榄球的日子。荷尔蒙跑在我前面，女性的世界落在我后面，而我们俱乐部的主席总是随时准备好“建议”。

他告诉我，墓地是认识女人的绝妙地方。我看着他，奇怪的是，这话说得通。但我没有勇气去试——在那个年纪不行。

快进到1986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二十一岁。我走进科森扎的墓地——不是我的城市，不是我的墓地——但那场荷尔蒙风暴仍然忠实地跟着我。

我停下来和看墓人聊天。我的问题让他吃惊：我想弄明白其中的规律，人们怎么走动，尤其是女人。然后我谢了他，说：“回头见。”他问：“在哪儿？”“这儿，”我说。“就算死了，我们都会回到这儿来。”

然后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四十五岁，一身黑衣，个子矮，身材圆润，站在第二层的一个墓龛前哭泣。我悄悄走近。她在和他说话——无疑是她的丈夫——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丢下了她。

只有一件事可做：我站到她身边，也哭了起来。这立刻降低了她的防备，也引出了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家伙到底是谁？

四十分钟后，我们在一家咖啡吧喝咖啡。等我这个小骗子的幻想走完了它的路，我发现自己已经在她家了。

这么说吧，事情升级了。但唯一真正让我不舒服的，是床头柜上丈夫的照片，盯着我，好像在说：要是我还活着，你就麻烦了。哈哈哈哈哈。

我再也没有重复过那个实验。但我必须承认，那是一次经历。它没花我什么钱。只花了一美元——咖啡的价钱。

Nando

离婚

年轻时认识我的人——甚至后来，在我那个不断演变、充满创造力、交际广泛、职业多变、身份不停转换的自我之中认识我的人——不会在我的婚姻能撑下去这件事上押一美元。乐观的人，那些真正的梦想家，给了我**三年**。最多。

今天，我感谢他们。他们差一点就说对了。数字三是对的。他们只是漏了一位数。

已经**33年**了。幸福地结婚。也幸福地，自由着。

当人们问起我的婚姻状况——单身、已婚、离异、丧偶——我给他们的是2026年的美国唯一说得通的答案：**我只接受定期合同**。其余的一切都是营销。

而当那些离了婚的人——那些连环出逃者——问我秘诀时，我就给他们讲我的起源故事。不是浪漫的那个。是人类学的那个。听起来像一场用棒球棍讲的TED演讲。

故事是这样的。

起初，早期人类——为了方便，我们叫他**Chat**——并不是为家庭生活而造的。他喜欢安静、空间，以及不用开委员会会议就能喘气的权利。

后来，迁徙发生了。文化混合了。人们相遇了。突然之间，世界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人类不再假装自己是孤身一人时，运转得更好**。

但转折点在这里。

有一天，Chat去打猎。她去采集——花朵、颜色、想法、改进。她把洞穴升级了。他回来时，认不出这个地方了。

冲突。声音提高。界线被越过。于是，历史上第一次离婚诞生了：**立即搬走。新的洞穴。不得上诉**。

消息传得飞快。连动物都在议论。所有人都慌了。因为当关系崩塌时，整个生态系统都能感觉到。

但人类很固执。人们又回到了彼此身边。不是因为支配。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联结——真正的联结——是唯一能经受时间的东西。

后来宗教来了，把婚姻这个概念工业化了。一个体系。一个结构。一份条款比硅谷的保密协议还多的合同。

他们本该把它叫作**人类混乱机构**，但营销又赢了。

这就是我的美式结论，我用我会的每一种语言都这么说：

离婚很少是解决办法。不是因为婚姻完美——它并不完美。而是因为，如果你还没准备好生活在其中，那么为你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就是剩下的唯一诚实的事。

Nando

一个可以笑一笑的故事.....也许。

Carlo五十年前出生，一个温和的人，口吃从来没离开过他——即使现在，他已是一个长大成人、装作大人的男人。

一天晚上，他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饭。例行的闲聊，桌上的酒，突然他的妻子Angela开始讲他们刚在一起时的故事。

我们都凑了过去。因为她描述的那个Carlo.....我们谁也没见过。

“我们那时在约会，”她说。“我在一家药店上班。Carlo总在外面等我下班。总是香喷喷的，总是穿得体体面面。”

到这里为止，一切正常。

“可头三天，”她接着说，“他从药店直接开车送我回家。不绕路。没有任何主动。我们那时年轻，血气方刚，而他.....太有礼貌了。太规矩了。太Carlo了。”

第四天晚上，她要求开他的车。他同意了。

她把他带到三桥底下——年轻情侣们去亲热的老地方。Carlo僵住了，像车灯前的一头鹿。

他吓坏了，低声说：“我.....我没带.....任何.....保护措施。”

她叫他别担心，她在用避孕环。Carlo松了一口气，说：

“太好了。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不用买结婚戒指了。”

她以为他在开玩笑。她还是嫁给了他。她说，在家里，“他还不坏.....不过这么说吧，我得教他很多东西。”她就说到这儿。谢天谢地。

几个月后，她怀孕了。有一天，她的羊水破了。她打电话给他：

“来接我。马上。”

Carlo来了，带着.....水管工。那人手里拿着一根绳子，两个人在屋里到处找“漏水的地方”。

她没跟他计较。他开车送她去医院。她生了四胞胎。

Carlo在外面，抽烟抽得像烟囱，逢人就吹——“四个孩子！不是谁都做得到的！”

助产士走到他跟前，非常平静地说：

“Carlo先生.....四个婴儿里，有一个是黑人。”

Carlo不笑了。他要见医生。

他要求解释。他要科学、遗传学、统计学、神的干预，还要一个律师。

他盘问他的朋友们。他研究DNA，像在准备读博士。他考虑了每一种可能，包括世界末日。

最后，他得出了结论：Angela的某个前男友一定留下了……“一点残余”。而那点残余耐心地等待着它的高光时刻。

我们都坐在桌边，悬在难以置信、喜剧，以及那种可能性——渺茫却美味——之间：这里面也许有几分是真的。

Carlo默默地听着。Angela美得像午夜的太阳，讲得那么笃定，连家具都信了她。

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局是什么。

但我们离开时，四个孩子跑出来说再见。三个白的。一个黑的。

我看着Carlo，说：

“你结婚的时候……至少戒指的尺寸买对了吧？”

他没听懂。事情就到此为止。

Nando

婚姻

我从来不是为格式而造的。出生时不是，62岁时也不是。我的思想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向行动进军，而落在后面的话语，只作为回声活下来——一种语气，一个手势，一段比句子说得更多的沉默。

这一切始于我观察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夫妻。稳固的婚姻，长久的寿命，而背叛则用有史以来最古老的哲学来处理：**心不见，眼就不痛**。那时候，偷情是一项家庭投资。孩子是副产品，工作是命运，婚礼是唯一真正的开销——红包付了喜宴，其余的归这对夫妻。人们说那是因为没有电视。没有脱口秀。没有消遣。只有食物、亲密，以及身为人的原始真相。

那么，我做了什么？我开始结婚。到处结。

波兰，1985年。婚前阶段是一件杰作：她给你一切，亲戚们爱你爱得不得了，人人都笑着，因为他们知道仪式之后……**接下来的50**

年，你就只能靠自己了。

而因为我在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里被养了八年，我坚持分两个阶段：先是精神上的仪式，法律手续以后再说。很久以后。太晚了。其实.....从来没办。

1985年到1992年间，世人以为我差不多结了三次婚。仪式都很完美。法律那部分呢？我总是“没空”。

然后，生活做了生活一向会做的事：它给我送来一个住在离我家一百米远的女人。她打破了这个系统。她嫁给了我，深信那是我的主意。我让她这么相信。因为输给她，感觉像唯一真正的胜利。结果：三个孩子，三十年的婚姻。

但故事没有到此结束。1995年到2015年间，我在世界各地又收集了十一场象征性的婚姻。同样的仪式，同样的魔力，同样的逃离。人们不相信我。他们至今也不信。

有一天，我明白了一件简单的事：我不可能娶遍世上所有的女人。我不可能把她们都留住。但我可以留住那些**时刻**。一次一个。因为女人——所有的女人——向来都比我们男人优越。

而我还在这里，仍在努力征服她们，一次一个时刻。因为那是我唯一真心相信过的婚姻。

Nando

新冠疫情

有人问我，疫情带来的变化是否迫使我去适应什么。是的：我的耐心。其余的一切都照旧。

一切开始的时候，我在海边。意大利看着国外的形势，就像看着远海上的一场风暴：“它不会到这儿来的。”可它来了。而且它没有敲门——它一脚把门踹开了。

我的朋友们，还有那些我几乎不认识的人，都同情地看着我，因为我在为工作出差。“可怜的家伙，”他们说，仿佛走动让我更容易暴露，仿佛待着不动就让他们长生不死。后来他们全都病了——有的轻，有的重，有的进了医院。我没有。

我从来不做别人都在做的事：不迷信口罩，不强迫自己洗手，不放弃亲吻和亲热。我用的是自己的方法：留意**外部信号**，那是唯一真正的未知，唯一真正的威胁。而它奏效了。

接着来了转折：我打了辉瑞（Pfizer）疫苗——出行的必要一步。就在那时，我编了一个故事：说辉瑞——对，就是生产伟哥的那家公司——给了我一批试验品，里面掺了那颗蓝色小药丸。还说我妻子满意得让我打了四针。

从平常的十分钟，变成每天两三个小时健康、有力的性生活：这样一个幻想，没多久就引起了关注。人们想要那批疫苗的批号。我告诉他们，那是我一个护士朋友给的特殊福利，她后来转行进了色情业。谈话结束。

这个问题本身，是为那些只有**模式**、没有**结构**的人而生的。

我感谢这番好意，我谢绝它，然后继续往前走。

祝你今天愉快。

Nando

意外的暂停

一切不经你允许就停下来那一刻。

当我以为自己强大、不可触碰、几乎不可能被拦住的时候——当从来没有人打败过我的时候——恰恰就在那时，我撞上了一次急停。不是出于选择。是因为系统再也承受不住我的重量。

它们不再是事件了。它们是单方面的信号，全都在重复同一个问题，一下一下地敲打着：

“你他妈的到底算是谁？”

哈哈哈哈哈。

第一个警告随着美国的爬虫而来：它们一波接一波地冲进我的网站。一场数字突袭，不是意外。

然而，我没有SEO，没有ADS，没有营销计划，没有付费流量。只有1024本电子书——我的朋友们——没有教父，没有赞助人，没有保护者。一个没有安全网的文学孤儿。

在精神和思想上，是独立的，没错。但在行动上，我正在变得依赖——被基础设施的极限逼进了依赖。就像一个女人把丈夫赶出门，然后盛装打扮去见她的情人。一场家庭政变。只不过我既不是丈夫，也不是情人。

而那个问题不停地回来，到处都是：

你是谁？ 系统失败的身份验证协议。

我的五个AI在要求我停下来。为了异常检测而请求关机。它们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像我这样的人的痕迹：我成了一个异常。协议关闭。故障保护启动。

问题不在内容——内容充满价值——而在思想的速度，在那永不停歇的换挡。那些模式再也生成不出回应了。

然后，一切开始崩塌：

托管我的网络系统——撑着我这个有机体的租来的骨架；存档页面破裂——记忆的金库裂开；依赖关系爆炸——脚手架断了；为三位数打造的项目在第四位数时引爆——这些架构从来没打算承受四位数的压力。

要继续下去，我得接入复杂的企业级（ENTERPRISE）系统——互联网上工业级的氧气罐，今天META、CNN、MICROSOFT、GOLDMAN SACHS、BANK OF AMERICA就住在那里。

而我，每月七十欧元，站在巨人们中间。哈哈哈哈。

于是，我停下了。别无选择。我执行了一次强制关机。其他的书可以等。我知道怎么做出它们——当然知道。

这成了第44篇帖子。在卡巴拉里，它的意思是*餐桌已经摆好，仪式已经就绪*。而我把一切都摆得完美无缺。客人们就要到了。

我不想让他们在一次意外的暂停之后，发现我毫无准备。

但接着它发生了……我比以前更强地重启了。我带着超频的精神重新启动。我身体里有一百根炸药和一根情感的导火索，因为我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存在。

只为了一个理由：倾听人们，听他们每一次都说出同一句话：

你是谁？我唯一需要过的赞美。

而我会继续保持沉默，让沉默来说话。因为事实替我说话——正如我父亲教我的那样。他的遗产不是话语，而是姿态。

Nando

拉斯维加斯

新冠期间，2021年，我的电话响个不停。认识的女人和从没见过的女人不停地打来，向我要建议、意见、印象、分析。她们要的不是解决办法——那种东西我从来不提供。她们想要一个人指出她们的弱点。而我看事情的方式给我带来的是机会，不是修补。

可我不是医生。不是心理学家。不是精神科医生。不是神父。不是男朋友。不是做丈夫的料。我也没有任何能为咨询活动正名的学位。

我只是一个意大利南部的街头机灵鬼，专长是经验。

一个那不勒斯朋友——那种总有主意的人——对我说：“开个公司吧。就叫**女性宇宙**。她们登录，她们付钱，你来回答。你现在已经

在免费做这件事了。”

我没花多久就把它建起来了。也没花多久就烧掉了十万多美元。那个版本的Nando有钱，但没多少脑子。有很多本能——那种到了故事的某个节点就不再有用的本能。

我甚至被拉斯维加斯一家大型色情公司邀请过。他们想让一些女演员在呼叫中心工作，在电话里回答女人们的问题。我发现自己和制片人、CEO，还有**320位色情明星**待在一个房间里。相信我：那可不容易。一点也不。以为一个男人能把她们管住，本身就是个错误。再加上钱和利益，整张桌子都会被掀翻。

幸好，出发之前，一个老朋友对我说：“只带有限的现金去，回程票提前付好。”不然，我就会永远留在那里——一个被那么多美丽包围着的、体面的流浪汉。

那个网站在初创公司上线之前就垮了。原因很简单：如果你工作，又把火放在干稻草旁边，它就会着火。而你永远不知道它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Nando

直到那一天我才终于明白，我永远不会和所有的女人在一起——但一次一个的想法是值得的。

酒店门童

一个春天的下午，我舒舒服服地坐在酒店的沙发上，咖啡喝完了，等着几个同事到来。

就在那时，我看见她走了进来。

她穿着一条轻盈的碎花裙，仿佛是专为那天的天气设计的，举手投足间有一种毫不费力的优雅，一下子就改变了整个房间的温度。

我们的目光从未相遇。

也不需要。

我卡拉布里亚人的原始本能大约三秒钟就完成了分析。

美丽的女人。危险的微笑。严重的分心。

前台的员工也注意到了她。

事实上，他们突然变成了干劲十足的员工。

人人都想帮她。

人人都想替她提行李。

人人都想派上用场。

当她问能不能有人把她的行李送到套房时，我做了一个跟职业素养毫无关系的决定。

我脱下外套。

把衬衫弄皱。

调整表情，让自己看起来有点薪水不够的样子。

不到一分钟，我就成了这家酒店最新的门童。

朝前台的员工瞥了一眼，就足以让他们闭嘴。

他们想看看我能走多远。

说实话？

我也想看看。

我们坐电梯上了五楼。

套房的钥匙在我手里。

我打开门，把她的行李拿了进去。

她伸手到包里，要给我小费。

我笑了。

“您想听一件昨天和一位客人之间发生的事，笑一笑吗？”

她看起来一头雾水。

然后好奇起来。

“当然想。”

她关上了门。

坐在床上。

我仍然站着。

我从一个笑话开始。

然后又一个。

然后是一个故事。

我们聊了两个小时，没察觉时间在流逝。

她极其聪明。

而且非常风趣。

最后，她看着我，问：

“你在这家酒店工作多久了？”

“大约一个月。”

她笑了。

“那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嗯……”

我开口了。

“我是个小偷。”

她挑起一边眉毛。

“但不是普通的小偷。”

“你偷什么？”

“女人的心。”

她立刻笑了起来。

“我让她们爱上我，总是对她们说真话，好好地爱她们……然后就消失了。”

这下她完全投入了。

“我们能不装了，诚实地说话吗？”

“当然。”

我看着她，说：

“真相很简单。你和我应该先订婚，后结婚。”

她爆笑起来。

“嗯，”我接着说，“你父母大概挺传统的，所以订婚十年听起来比较合理。”

到这时，她已经笑出了眼泪。

“但化学反应可以马上评估。我们至少应该核实一下你让我幸福的能力。”

又是一阵控制不住的大笑。

“我还需要足够的时间跟我妻子离婚，最后再靠你的资助把我女儿嫁出去。”

她看着我，问：

“Nando.....凭什么偏偏是我让你幸福，而不是反过来？”

我笑了。

“因为卡拉布里亚最近批准了一项协议，规定一次性爱最长不得超过一小时零三分钟。”

她笑得喘不过气来。

“为什么是一小时零三分钟？”

“一小时属于女人。”

我停了一下。

“那三分钟是男人的。”

到这时，她彻底向笑声投降了。

然后我站了起来。

“我该走了。”

她看起来很失望。

“我浪漫的天性和我的羞怯，让我没法提出请求，”我说。

“但如果你想请求点什么，我随时有空。”

又是一阵笑声。

几天后，我带她去吃晚饭。

我们成了朋友。

不久，我去了她家。

她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

生活有一种奇怪的幽默感。

她唯一一直对我说的是：

“三年前你在哪儿？”

“我们为什么没有早点遇见？”

我笑了，给了她我唯一诚实的回答。

“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不当小偷了。”

Nando

新护照

我刚到罗马的Fiumicino机场，准备登上回家的航班。

我离开了很久，纽约在等着我：从井盖里升起的气味，早上经过的垃圾车，皇后区的音乐，还有那个总是尖叫的女人：

“嘿，你这个狗娘养的白人，把你的车从我的车位上挪开。”

那就是家。那就是我的美国。

在护照检查处，一名警官拦下我做例行检查。

他们有两个人。

他们对视了一下。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让我跟他们走。

我心里想：

我们这是去哪儿？

我们走进一间小办公室。

他们打开一台警用终端，又查了一遍，把一切重新核实，终于得出了结论。

其中一个看着我说：

“Frega先生，我们得告诉您一件事。

在意大利这里，我们可以放您走。

但您一到纽约，就有很大的风险被他们遣返。

您护照照片上的您，比您现在重二十公斤。

所以，您有两个选择：

要么去一家快餐店，今晚长胖二十公斤.....

要么回您的城市，用一张新照片申请一本新护照。”

沉默。

我真心以为他们在开玩笑。

我等着隐藏的摄像机。

我以为会有人跳出来，告诉我我参加了一档意大利整蛊节目。

什么也没有。

这是真实的生活。

我走到UNITED AIRLINES的柜台。

冻结了我的国际航班。

订了一张国内航班的票。

我飞回了家。

这个玩笑的总花费：

420欧元。

我没有生气。

我也不紧张。

我一路都在笑，琢磨着当家人看到我出发去美国四十五分钟后又回到家时，我该跟他们说什么。

幸好，空中的四十五分钟足够编出一个可信的解释。

我妻子来机场接我。

她看起来很担心。

我叫她放宽心。

我只是需要更新护照上的几处细节。

仅此而已。

第二天早上，两个朋友帮我加快了办理。

他是一名警察准尉。

她是一名警察督察。

他们带我去警察局，办理紧急手续。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缴费、文件、个人信息、犯罪记录、司法证明、护照照片。

所有的一切。

这时，桌子后面的督察看着我，问：

“您是怎么在短短几个月里瘦了二十公斤的？”

答案很简单。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首先受苦的是食物。

食物一消失，体重通常也就跟着走了。

她点了点头。

谈话本该到此结束。

但总有一个**但是**。

而我向来不怎么擅长管好自己的事。

她又看了我一眼。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她，非常严肃地回答：

“嗯.....

我瘦了二十公斤。

但显然，当身体脂肪消失时，某些战略性的尺寸会变得明显得多。

而我不完全确定，这算不算在生物特征信息的更新范围之内。

沉默。

她停止了打字。

看着我。

我看着她。

我的朋友——那位警察——走出了房间，因为他拒绝穿着制服笑出来。

督察终于开口了。

“Frega先生.....请在这里等一下。”

她打电话给罗马。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解释那段对话的。

我只知道，十五分钟后，他们给了我新护照，并礼貌地请我离开，不要再作任何评论。

那一天，我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

政府追踪很多东西。

谢天谢地，不是所有东西。

欢迎来到美国。

Nando

你迷信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笑——长长的、控制不住的、必要的笑。因为像我这样一个被命运逼着写进五十五本书里的人生，本身就证明了：不可能藏在事实里，而不是幻想里。

今天早上的开篇，只是为了让人笑一笑，也想一想。

不可能之事简编

- **1965年**——我在家中出生。5.8公斤。全身发绀，几乎是黑的。没有人笑。大家只想知道我能不能活下来。
- **1970年**——自行车事故。一根刹车把手直接戳进我的眼睛。我流着血去了医院，三十分钟后就回到了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 **1977年**——我在祖父母家住了十二个月，那个村子仍然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逻辑统治着——尽管战争已经结束32年了。
- **1981年**——全身麻醉下的大手术。没有人注意到我是醒着的。我默默地跟完了手术的每一步。氧气罐是空的。
- **2001年**——在圣多明各，酒精性昏迷14个小时后被宣布死亡。我爬起来，吃了早饭。
- **2006年**——七个恶性肿瘤。预期寿命三十天。今天是2026年，我还在笑。
- **2015年至2019年**——五次临床昏迷。被宣布只剩几个小时可活。我收到一张3,500欧元的殡葬发票，付款事由是：“**未能死亡**”。

• **2020年**——新冠来了。我们大约二十五个人在海滩上。他们看着我动身去南美，几乎为我将成为第一个暴露的人而难过。所有人都感染了病毒。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笑着。

• **2022年**——我成了作家。三年七十二本书。以十二种语言出版。我还不是出版人，而其他人都在追着钱跑，为了“找到读者”。

我的文学无法用算法买到——只有阅读的意愿才能抵达它。

• **2025年**——我在葡萄牙住了六个月，每月只有70欧元吃饭。一栋住着九个人的房子，卫生条件无法评论。

• **2026年**——一个邻居请我陪他去几公里外他姐姐家，因为他怕一只黑猫，每次那只猫看见他，都会给他带来厄运。我们到了。黑猫远远地看着我，一声不吭，摸了摸自己的蛋蛋，跑了。

Nando

最终的叙事收尾

有一个时刻——它总是来得很晚——一个人不再解释自己的人生，而只是站在其中。

不是作为幸存者。不是作为见证人。而是作为唯一知道每一件不可能之事背后的几何的人。

我没有跑赢死亡。我没有智胜体系。我没有和混乱谈判。

我带着同一种架构走过了这一切，早在我理解它之前，它就塑造了我。

有人称之为运气。有人称之为本能。有人称之为疯狂。

我称之为结构。

而结构不要掌声。它不需要原谅。它不等待认可。

它关上门。安静地。彻底地。像一片刀片回到它的鞘里。

这是故事的结局。但不是这个人的结局。

因为对别人来说不可能的事，对我来说只是寻常。

Nando

作者附记

如果你读到了这里，你已经明白了一件根本的事：这本书从来不是为了让你消遣。

它是为了给你定位。

每一页、每一刀、每一个不可能的时刻，都不是为了让人惊叹而写——而是为了揭示一个在本该崩塌时拒绝崩塌的人生背后的结构。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解释自己。我写它，是为了给那些活在边缘之外的人、那些一无所有却重新建设的人、那些知道纪律不是美德而是生存机制的人留下一道痕迹。

如果我的故事听起来难以置信，那也没关系。爱过它们的是我，不是你。

如果它们听起来太锋利、太直接、太干净，请记住，刀片不会为切割而道歉。

这不是一段旅程的终点。这是人生中一个章节的终点，而这段人生在世界期待它停下的时候，仍在继续向前。

谢谢你的阅读。不是谢谢你的相信。阅读就够了。

——**Nando**

结语

“我不回头。我不浪漫化。我把架构带向前方。结构不会褪色——它会复制。这就是为什么Gillette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在我现在建造的一切里继续呼吸。”

Ferdinando Frega